

目 次

论文

自由与认同:数字游民文化与本土化社会实践研究

——基于西南某地的田野调查 孙艺珂 周承磊(1)

智能时代劳动范式的数字转型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 周光港(18)

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下数字异化的深层逻辑与扬弃进路 魏金鹏(37)

数字时代的社会自我

——破解碎片化自我困境的路径探索 高思蓉 王化起(52)

赛博格工人、“科技恶魔”与金币农夫

——东方主义遭遇数字时代 何祎金(66)

研究报告

中国个人信息保护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欧盟经验的启示

..... 张月明 李汶龙 李汶锴 李子豪 李傲兰(85)

理性、权力与生态

——平台研究相关中文文献述评 袁方杰(114)

译文

气候变化与人工智能政治路径

——人工智能和人类能动性下的技治主义民主困境

..... 马克·科克伯格 亨里克·塞特拉 著

李 帅 李 芳 译(138)

归因法:网络攻击来源归因规则

..... 德尔伯特·特兰 著 裴 轶 强心语 译(160)

书评

数字技术支配下的生活世界

——读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 王国伟(203)

CONTENTS

THESIS

Freedom and Identity: A Study on Digital Nomad Culture and Localized Social Practices

Based on Fieldwork in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of China

..... Sun Yike, Zhou Chenglei(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Paradigm in the Age of Intelligence: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Zhou Guanggang(18)

The Deep Logic and Sublation Approach of Digital Alie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Wei Jinpeng(37)

The Social Self in the Digital Society: Exploring Paths to Resolve Fragmented Self Dilemmas

..... Gao Sirong, Wang Huaqi(52)

Cyborg Labor, “Devil of Science” and Gold Farmer: An Encounter Between Orientalism

and Digital Times He Yijin(66)

RESEARCH REPORT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Study of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Experience: Insights from the EU’s Experience

..... Zhang Yueming, Li Wenlong, Li Wenkai, Li Zihao, Li Aolan(85)

Rationality, Power and Ecology: A Review of Chinese Literature of Platform Research

..... Yuan Fangjie(114)

TRANSLATED TEXT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olitical Pathways of AI: The Technocracy-Democracy Dilemma in

Ligh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uman Agency

..... written by M. Coeckelbergh, H. Sætra; trans. by Li Shuai, Li Fang(138)

The Law of Attribution; Rules for Attributing the Source of Cyber-Attack

..... written by D. Tran; trans. by Pei Yi, Jiang Xinyu(160)

BOOK REVIEW

The Living World Dominated by Digital Technology; Reading Jamie Susskind's *Future Poli-*

tics; Liv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Tech Wang Guowei(203)

数字技术支配下的生活世界^{*}

——读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王国伟^{**}

摘要：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人类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数字化变迁。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为传统权力概念赋予了数字化特征。这种权力的本质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针对《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试图从技术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本文基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了客观评析。

关键词：数字技术 数字生活世界 数字权力

人类共同生活的方式总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发生重大变化。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直接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生活世界，这正是英国学者杰米·萨斯坎德(2022)的新作《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Future Politics: Living Together in A World Transformed by Tech*)对数字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在数字生活世界中，数字技术不仅重新诠释了权力的来源和形式，也给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带来了诸多重大影响。突破数字系统的控制，防范数字技术的风险，已成为我们不得不积极应对的一个共同挑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述行理论及其本土化研究”(项目批准号:23BSH1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王国伟,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一、生活世界的数字化变迁

“生活世界”一词源于德语 *Lebenswelt*, 其一般性含义是指“所有构成我们个人或集体世界的即时体验、活动和联系”(萨斯坎德, 2022: 3)。作为数字技术的大规模运用与生活世界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崭新人类生活形态, 数字生活世界将人、强大的机器和充足的数据连接在一张相当复杂精密的网络之中。它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 拥有日益强大的数字系统。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化数字系统, 尤其是深度机器学习算法技术和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算力, 为数字生活世界搭建起了基础性的技术构架。目前, 人工智能系统已经在自动驾驶、自然语言翻译、人脸识别、模仿人类说话、复杂的市场战略制定、疾病的筛查和预测、各种技巧和战略性运动项目等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能力。借助机器学习技术, 人工智能系统还将摆脱其人类创造者的限制。机器学习的算法, 尤其是利用神经网络进行的深度学习技术, 通过调动大量的数据, 可以自行识别、创建模型并进行推断以完成任务, 为人工智能系统提供了实现自我、完善自我的机制。加之可用数据的海量增加、以几何级数增长的算力以及拥有强大算力的计算机器的产生,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获得强劲推动力。正因如此, 数字生活世界中成千上万种原来只有人类才能从事的活动, 如今都可以由数字系统更快、更高效、更准确地完成。此外, 一旦拥有一定认知和抽象思考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或全脑仿真技术获得突破, 数字系统还将在更广阔的领域释放更为强大的能力。

第二, 日益综合化的技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密不可分。从私人领域的生活起居、日常穿戴到公共场所的公共服务、智能城市, 数字技术正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经验, 显示出超强的连接性。借助各式各样的智能设备, 数字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

息交换能力。人类连接方式的更新,带来最重大、最深远的变革集中表现为信息、文化和知识的生产与分发模式的去中心化。在万物互联时代,人和物理世界互动的广度与深度,正随着越来越敏感的传感器探测能力的增加而大幅提升。日益敏感的技术已经从工业生产、市政管理等宏观领域,深入更微观的人类身体内部甚至情绪情感领域,这将促使人与机器的关系发生精神上的巨变。不仅如此,随着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技术的发展,人一机关系还会从根本上变得更具有沉浸性。届时,人和机器、线上和线下、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也将更加模糊。最终,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虚实一体的世界里。

第三,数字生活世界还是一个被普遍量化的社会。进入21世纪,随着基于印刷的信息系统过渡到数字系统,信息的生产和处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今我们生产信息的速度,也像计算机的算力一样呈几何级数增长。初步估算,我们每10分钟产生的信息量,等于最初1万代人类所创造信息量的总和。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是通过数字系统或数字平台展开的,加之数字信息的存储成本日益降低、复制成本极为低廉,不仅人们的动作、话语、行为、关系、情感和信念等方面的内容都将作为数据被捕捉和记录,甚至来自自然界、机器行为和建筑环境等领域的数据也会被收集起来。这些有意或无意留下的数字化足迹,经过数据专家的清洗、处理和组织,都会成为用来解读、分析人们的思想、信仰、关切、健康、市场活动、音乐品位及性取向等方面的重要知识,由此可以绘制出一张细微而又丰富的人类生活数字地图。因此,数据是有价值的,收集到的某一方面的数据越多,它的价值就越大,其用途也就越广泛。

二、数字权力的新形式

在数字生活世界中,数字技术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无处不在的数

字技术正成为权力的新来源和新表现形式。所有的数字技术都是由代码语言、算法公式操作的,虽然它们不是法律本身,但是能够精细地约束、指导或操纵我们的行为和感知,因此代码和算法就是力量。而且,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人们也将越来越多地沉浸在完全由代码和算法构成的世界里。在那里,代码和算法不仅是权力,更是数字生活世界的本质和现实。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秩序基石的基本问题,“何为权力”“权力有何种形式”以及“谁将行使权力”都将迎来巨大的变化。

权力最纯粹、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暴力。一直以来,暴力的合法使用权始终掌握在国家及其执法人员手中,然而数字生活世界中暴力的使用将发生三方面的重要变化,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过去对暴力运用方式的认知。第一,暴力的数字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由数字系统实施,一些法律规则由人强制执行转变为由数字系统强制执行,人工智能系统也会赋予法律无须经过某种正式程序就能够根据环境变化做出快速精准的适应性反应的权力;此外,法律将越来越多地以代码而非文字的形式出现,这种数字法将是一种强迫或限制我们行动的全新方式。第二,暴力的私有化。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国家是唯一有权使用或允许其他主体使用暴力的主体。然而,在数字生活世界中,我们时常受到私人来源代码的支配,由代码决定的数字平台准则、嵌入设备的代码规则等技术力量的影响无处不在,这将给掌控技术的科技公司带来私权力。第三,暴力的自动化。在不受人为控制的情况下,施加暴力的自主数字系统也是存在的。

权力并不都是暴力性的,在数字系统作用下还产生了许多相对温和的权力形式,如视觉监视和各种收集、存储、处理他人信息的能力与方式,这些都是萨斯坎德所说的“审查”。这种广泛存在的权力形式,“它能看见别人却又不被别人看见,它能了解其他人,却又能保持自己不被别人所知”(萨斯坎德,2022:89)。进入数字生活世界,作为一种全景式“规训权力”(Foucault,1980:39)的审查能力与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第一,当我们越来越多的行

动、表达、动作、关系、情感和信仰被数字媒介技术永久或半永久记录下来时,人类生活的可解读性将大大增加,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将成为被算法描述的人;第二,各式各样的家用数字技术、便携式设备的运用,促使审查越来越具有隐秘性,甚至已经扩展到私人生活领域;第三,经由审查收集的数字形式的信息,不仅比以往任何形式的信息都更容易储存和复制,而且它还是不朽的,可以贯穿整个人生;第四,功能强大的数字系统,将促使我们生活各方面可预测性的广度和精度变得越来越大;第五,人们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多地由分数、评级和排名进行评估,而评级结果决定着人们是否能够获得有价值的社会物品。作为以上五个方面变化的累积结果,数字技术带来了审查能力的增强与方式的革新,从而极大地强化了规训我们的权力。

权力的行使还表现在对人们的所知所想以及关于世界的看法进行“感知控制”,这一点其实早已被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意识形态理论所揭示。著名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Castells, 2013: 3)在《传播力》一书中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感受和思考的方式决定了我们行动的方式。”因此,那些控制感知的人,将会更多地决定我们感受和思考的方式,进而决定我们的行动方式。对信息的过滤始终是一种强大的感知控制手段,“如果你控制了一个社会的信息流动,你就可以影响这个社会对是非、公不公平、干不干净、得体不得体、真实还是虚假、已知还是未知的共同观念”(萨斯坎德,2022:109)。以印刷、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20世纪信息过滤的日常形式。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社交媒体和数字新闻平台让人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互联网也被用于更精确、更广泛地控制我们传递和接收的信息,这些变化意味着传统大众媒体垄断过滤手段的终结。随着数字生活世界的到来,人们所感知的世界将越来越多地由以算法为基础的数字系统向我们揭示或隐藏的内容而决定,数字化的过滤器主要包括各种量身定制的新闻、搜索引擎、通信邮件、情绪以及即时性的感官体验等。总之,基于数字技术产生的感知控制,是一种难以意识到施加在人们身上的权力形式,它看似更“弱”却能

够悄无声息地影响人们的情绪、情感、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由于过滤方式的不同,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将各不相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观念冲突问题,这将是感知控制更为深层的影响。

总之,生活世界数字化的发展趋势,给传统的权力概念带来了新的特征。笼统而言,权力概念包括控制权、行动权两方面(Mill, 2009:93),但萨斯坎德(2022:60)在该书中更多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即控制权方面的转变:首先,以暴力、审查和感知控制为代表的权力形式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数字技术赋予了它们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工具所能给予的力量。其次,权力并非必然与暴力、武力结合在一起,但是“谈论非暴力的权力事实上是多余的”(卢克斯,2008:23)的论断同样站不住脚。事实上,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权力的非暴力形式将会更加丰富多样,其作用方式将会越来越精确,控制范围已经从我们外在的身体、行为扩展到内在的所知、所感和所欲。因此,数字权力将实现对我们的全景式控制。最后,由于大型科技公司掌握着数字技术,它们也将拥有真正的权力。不过,这是一种追求私人经济利益的私权力,它不可避免地会强化科技公司的政治影响力。

三、技术权力的多重政治影响

萨斯坎德(2022:xxi)认为,权力在本质上的变化将影响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首先表现为自由的范围拓展和实现方式的更新。来自数字技术的功能可供性,为人们未来可能拥有的自由带来了诸多可能性。乐观主义者认为,我们将获得数字解放,能以全新的方式行动和思考,进而产生新的创造、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形式;与此相反的悲观主义者则坚持数字化的异议,并预测数字技术将是强者践踏弱者自由的另一种方式。显然,这两种关于数字技术与自由关系的看法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但是人类自由的总体水平总是以对某些自由的限制为前提的,正所谓“限制使我们自由”(萨斯坎德,

2022:146)。萨斯坎德(2022:148)提出了为自由设定界限的合理主张,认为“某些‘明智的限制’系统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在数字生活世界中保持令人满意的‘总体自由程度’”。因此,来自国家制定的法律体系、公正的数字执法以及精细的数字法律,就成为我们共同打造“明智的限制”系统不可或缺的内容。

除了国家影响个人的自由之外,科技公司也拥有同时增强和限制人们自由的能力。“它使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但同时也根据代码的约束限制我们的行为。”(萨斯坎德,2022:150)在数字生活世界中,人们获得了数字自由,同时几乎所有的言论和信息交流都受社交媒体平台和技术中介的调节、控制,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权力集聚在控制技术的科技公司手中,科技公司也将更多地塑造和限制我们的自由。对此,萨斯坎德(2022:158—163)进一步指出,科技公司的工作应该回到尊重社会“应该允许”和“不应该允许”的基本原则上,如保护人类不致自我伤害且能坚守共同的道德感。

西方政治的某些方面,同样因数字技术而产生不可逆转的改变。相对于古希腊的古典民主、西方的现代自由民主和竞争性精英主义模式(代议制民主),萨斯坎德认为未来的每一种民主模式,都是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的,如协商民主、直接民主、维基民主和人工智能民主。这里仅以协商民主为例,说明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西方民主模式之中的协商,被认为是“共同体成员理性地讨论政治问题,以找到所有(或大多数)理性人士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的过程”(萨斯坎德,2022:170)。在数字生活世界里,网络信息技术给少数大众媒体和大量分散的个人提供了更多积极参与讨论、辩论和协商的机会。然而,个人表达意见机会的增多,并不必然广泛提高协商或政治讨论的质量,这是因为它会受到来自数字技术的感知控制、碎片化的现实、匿名或非实名参与以及在线机器人的严重威胁。针对这些挑战,萨斯坎德强调既需要在技术层面警惕数字媒介影响人们言论的方式,也应基于政治共同体原则凝聚碎片化的社会现实。

社会正义问题是萨斯坎德关于数字技术影响未来政治的第三个重要领域。在数字生活世界中,作为社会正义本质的分配和承认高度依赖于算法,而算法的不公正将直接导致这两个方面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在分配正义方面,随着数字生活世界中使用算法的地方越来越多,尤其是能够学习知识和技能的算法出现,“将与市场和国家一起决定我们获得重要社会物品的途径”(萨斯坎德,2022:219)。作为一种新的、重要的影响分配正义的机制,算法不仅被广泛地用于判定人们是否具有获取工作、贷款、住房、保险等社会资源的资质,还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提供市场信息以及干预市场价格。在这些实例之中,作为执行任务或解决问题指令集的算法,对如何分配、根据什么标准分配、优先考虑谁的利益等问题的不同定义,直接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在承认正义方面,算法也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对人类进行识别、排名、分类和管理,这样在数字代码领域就会展开为争取社会承认的斗争(萨斯坎德,2022:228)。长期以来,争取承认的斗争主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随着数字生活世界的到来,人们对承认的追求已经扩张至数字系统,并表现为媒体平台之中的粉丝、好友、收藏、点赞和转发等方面的排名。算法在其中的影响,体现在“决定了这些排名和排序系统如何发挥作用,选择谁被看到,谁被隐藏,谁入局,谁出局,哪些内容会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哪些内容注定无人问津”(萨斯坎德,2022:229),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的过程。

萨斯坎德认为,算法在资源分配和社会承认领域极其容易引发不公正的问题。追究其成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算法的数据不公正,即算法应用是基于选择不当、不完整、过时或存在偏见的数据做出的;二是算法的规则不公正,主要包括显性不公正规则和隐性不公正规则两类——其中,前者是依据宗教、种族、性别、相貌等不公正标准做出的,后者则是由间接导致某个群体受到不如其他群体的待遇而导致的结果。关于是否存在中立的算法问题,萨斯坎德强调,即便是在群体之间保持中立的算法规则,其结果仍然可能导致

社会不公正的产生。其原因在于,数字系统的学习对象——人类——是有缺陷的,而看似中立的算法规则可能会重复和巩固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不公正。因此,在中立算法规则的表象之下,实则掩盖着中立谬误的不公正。

数字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正义问题,还表现为数字系统将促使西方社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一方面,当数字系统更多地涉足此前只能由人类完成的任务时,经济上可能导致大量工作岗位的减少和大规模的失业,这是技术导致失业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还将进一步加剧西方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数字生活世界中的资本要比生产劳动产生更多的财富,而相对于优质的传统资本(土地、股票等)和生产技术资本,数据作为数字生活世界的经济命脉,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之一(萨斯坎德,2022:264)。然而,这些日益重要的资本形式都掌握在以字母表(Alphabet)、亚马逊(Amazon)和脸书(Facebook)为代表的少数大型科技公司手中,在强大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的推波助澜下,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将聚集到极少数的精英阶层,而流向没有资本的劳动者的财富则会日益减少,萨斯坎德将这个过程形象地称为“财富旋风”。数字生活世界中的这种财富分配方式,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扩大的少数富有的精英与大多数贫穷的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财富差距,这将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显而易见的一种不平等形式。

四、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考

身处数字生活世界之中的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将与人类“对垒”并可能超越人类甚至控制世界的数字系统。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窘境是,既难以完全理解又无法充分驾驭数字系统。为了避免陷入完全遭受强大的数字系统控制的命运,萨斯坎德结合个体、科技公司和国家三个主体,分别从技术运作的透明化和技术权力的分割两个维度,提出了突破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对此,本文从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角度进行评析。

在萨斯坎德看来,数字系统并非纯粹的技术,过去和未来的问题都可以归于个人的选择,亦即它们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造成的问题。因此,他特别强调应对数字系统支配的个体责任。那些在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员——从首席执行官到普通程序员——由于他们都扮演着一种具有特别影响力的角色,就必须承担起哲人的使命,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工程师”。那些不在技术领域工作的人士,也需要保持对数字技术的警觉,并努力去塑造它们,如赋予公民对管理自己的数字规则和数字系统以直接发言权。

对于科技公司而言,萨斯坎德强调抑制它们的科技权力。我们知道,科技公司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拥有较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这些力量源自它们所掌控的数字技术。在数字生活世界里,数字技术就是政治本身。因此萨斯坎德指出,科技公司的权力获得必须要以合法性为前提,而合法性又源于一系列基本的政治原则,包括人们的同意原则、权责相当的公平原则以及体现用户共同价值观的原则。通过赋予科技公司权力的合法性来制约其权力的思路,反映了萨斯坎德坚持让权力对公民更加负责以及实现技术民主化的观点。

对于国家而言,萨斯坎德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应对之策:一方面,面对随着数字系统而不断增强的国家权力和执法能力,他主张提升人们问责政府能力的办法以应对国家权力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从而确保国家权力得到监管;另一方面,国家必须对数字系统和掌控数字技术的高科技企业实施监管。一种是透明度监管,即加强算法的审核,确保有关算法、数据使用以及从编码到技术的价值观透明度;另一种是结构性监管,指通过政治干预促进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打破技术垄断、防止串通、监督并购行为,目的在于防止任何一个科技公司拥有垄断或控制数字权力(暴力、审查和感知控制)之中任何一个的能力。显然,萨斯坎德将技术权力的分权视为保障自由和合法性最好的甚或唯一的方法。

实现数字技术的透明化和数字权力的分割,贯穿在萨斯坎德关于突破数

字系统控制的思路始终,其中或多或少流露出对日益加强的数字系统控制的无可奈何。尽管他也注意到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个“政治体制”(萨斯坎德,2022:301),但是他最终开出的“药方”仍然没有超出西式民主和三权分立的窠臼。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数字系统“大兵压境”的背景之下,这种传统的解决之道虽然具有一定启发性,但能否真如萨斯坎德所期待的那样有效地解决问题?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忽视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数字技术的政治经济性质。

数字技术重塑当代资本主义,这一事实已经为近年来不断涌现的诸如数字资本主义(希勒,2001)、数据资本主义(迈尔-舍恩伯格、拉姆什,2018)、平台资本主义(斯尔尼塞克,2018)等研究成果所证实。不管用什么概念来统称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深刻变化,它的基本运作逻辑都不可避免地深深嵌入在算法系统之中。在蒲若迪尼克(2022)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算法运作具有不透明与模糊性、数据化、自动化以及工具合理化四个基本特征,它们不是算法本身普遍固有的,而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这一结构性原因的产物。亦即,为了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西方高科技公司更倾向于保持数字系统令人无法想象的复杂性,因此“技术黑箱”的透明化无法真正实现,而且各种“黑暗代码”所产生的不可知性更容易导致缺少问责和逃避监管现象的发生。

关于数字技术的权力分割问题,更是面临着无法逾越的双重困境。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下,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与高科技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多体现为政商合谋式的利益共同体,因此无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对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权力进行新的分割,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另一方面,对于数字技术企业而言,它所拥有的技术权力往往植根于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连通性、聚集性、开放性等属性,这正是数字经济的重大优势之一。因此,纵使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反垄断法,能够相对削弱或防止某一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权力的高度垄断,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技术权力集中的难题。

行文至此,让我们重新回到《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一书的起

点:生活世界数字化时代的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尽管在资本主义的技术政治经济背景下,萨斯坎德关于我们摆脱数字系统控制的思路行不通,但人类对此也不是绝对无能为力的。事实上,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打破西方以利益为导向的政商合谋式的政治体制。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迎来了飞速发展,在数字中国建设进程中形成的党和政府、市场与社会相协同的治理实践,展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技术政治经济学在实践中的独特优势,这或许能为全球数字系统治理提供新的启示和经验借鉴。

参考文献

- 卢克斯,2008,《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迈尔-舍恩伯格、拉姆什,2018,《数据资本时代》,李晓霞、周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蒲若迪尼克,2022,《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逻辑》,陈文旭译,《国外理论动态》第6期。
- 萨斯坎德,2022,《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李大白译,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
- 斯尔尼塞克,2018,《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希勒,2001,《数字资本主义》,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 Castells, M. 2013,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Mill, J. 2009,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art Hill*, New York: Seven Treasures Publications.